

网络舆情演化与舆情焦点转移:一个实证研究

张曙光^a,魏新^b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a. 政治学教研部; b. 科研处,北京 100044)

摘要:以 B 市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为例,通过详实的数据,从传播媒介、传播过程、舆情焦点三方面对舆情演化进行了分析。经过分析发现,在传播媒介层面,传统媒体在舆情传播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立体媒体的传播效果要超过平面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舆情焦点上,次生舆情的出现使舆情焦点发生了偏离,它的产生主要源于政府行为和公众认知之间的不匹配,以及一些媒体的刻意引导。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舆情演化;舆情焦点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0)02-0059-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0.02.007

Evolution and Focus Shift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 Empirical Study

ZHANG Shu-guang^a, WEI Xin^b

(a. Department of Politics Teaching and Research; b. Divis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Party School of Beijing Committee of C. P. C,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from public emergencies in city B use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opin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media, process and its focus based on detailed data. It is found that for the communication agencies, the traditional media is still predominant in the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where the three-dimensional media i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print one.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he government plays a leading role. As for the public opinion focus, the emergence of secondary public opinion shifts the focus, which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mismatch between government behaviors and public perception, as well as the deliberate guidance of some media.

Key Words: public emergency; public opinion evolution; public opinion focus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8.54 亿,较 2018 年增长 2598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61.2%,较 2018 年底提高 1.6 个百分点^[1]。由此可见,随着我国网民

数量的增加和互联网普及率的上升,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网络已经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体”,成了舆情传播的主要载体,因此网络舆情已成为舆情研究的重点。

网络自身的一些特点,如传播信息速度快、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17KDB045)

作者简介:张曙光(1989—),男,河南南乐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网络舆情研究。

传播主体多元、传播规律复杂等,增加了网络舆情研究的难度,使相关研究很难得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结论。比如,比较传统媒体和新媒体^①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的作用,一般认为新媒体发挥的作用要比传统媒体大,但这种观点是否符合事实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因此,网络舆情研究宜从微观着手,只有对具体的舆情事件有深入的理解,才有可能提出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观点。基于此,本文以 B 市突发的公共事件为例,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实证分析深化对网络舆情演化的认识,加深对具体舆情事件的理解。

一、问题的提出

(一) 文献分析

相比传统舆情而言,网络舆情虽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但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该领域,涌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截至 2019 年 12 月,在“中国知网”的文献检索中以“网络舆情”为篇名进行检索,发现相关文献 8 386 篇,可查最早的文献发表于 2005 年,此后总体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详见表 1。

表 1 网络舆情研究总体趋势

发文年份	发文量	发文年份	发文量
2005	7	2013	841
2006	5	2014	975
2007	31	2015	978
2008	57	2016	1 036
2009	133	2017	1 065
2010	301	2018	952
2011	440	2019	912
2012	653		

依据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在网络舆情演化的研究中,因研究视角和关注点的差异,可分为网络舆情的生成、演化过程、演化结构等

具体领域。

首先,对于网络舆情是如何产生的,大多数研究者一致认为它是对特定时间段内社会矛盾的反映,分歧在于对网络舆情和社会矛盾二者关系的理解。一方面,有学者指出,“舆情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其形成和发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2],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矛盾的存在决定了网络舆情的产生,二者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社会矛盾,网络舆情只不过是对它的一种反映。根据这种理解,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存在是一种客观必然,所以网络舆情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另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网络舆情的产生受民众心理感受和情绪影响比较大,包括主观焦虑的强化与放大、集群情绪渲染与个人理性的迷失、心理失衡与情感宣泄的交织碰撞等^[3],网络舆情是民众主观感受的一种表达,社会矛盾本身对网络舆情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不同的人和人群对同一个社会问题的感受是不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其次,关于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阶段划分,学者们依据不同的标准提出了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的说法,试图总结网络舆情演化的阶段特征,以发现网络舆情演化的规律。在早期的网络舆情研究中,把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如分为产生、传播、整合三个阶段^[4],或者是分为潜伏期、扩散期、消退期三个阶段^[5]。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意识到三阶段的观点在描述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显得过于笼统,不够具体,因此提出了四阶段的观点,把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分为散播、集聚、热议、流行四个阶段^[6],或者把网络舆情看作为一个生物体一样分为孕育、扩散、变化和

^① 对于如何界定新媒体,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并没有形成公认的标准。笔者认为,可以将新媒体两个根本性特征——互动性和数字化作为新媒体的判断标准。本文中的新媒体指微博、微信、论坛、贴吧、博客这类互动性强的传播方式;传统媒体指报刊、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站、APP,之所以将网站和 APP 归为传统媒体,是因为这两类信息传播方式互动性较弱。为了进一步区分,笔者将报刊、杂志、通讯社、广播这些通过单一方式(声音、文字等)传播的媒体称为平面媒体,把网站、APP 这些通过多种方式(声音+文字、文字+图片等)传播的媒体称为立体媒体。

衰减四个阶段^[7]。在四阶段观点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五阶段的观点,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就把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分为形成期、爆发期、高峰期、反复期和消退期^{[8][22]}。

最后,网络舆情演化结构研究关注的是舆情演化的整体性特征,即在网络舆情平息后,从整个舆情演化过程中发现一些结构性特征,以此作为将来应对类似事件的经验。关于网络舆情演化结构的重要性,有学者在对网络舆情两级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后指出,“对网络舆情的认识研究要从它的层次结构开始”^[9]。不仅是学者,我们一些党政部门同样强调舆情演化结构的重要性,如中宣部舆情信息局指出,分析舆情演化结构是认识舆情形成和变动的重要方面,“个别舆情影响局部舆情、整体舆情的产生和变动”^[10]。

简言之,在网络舆情产生、演化过程和演化结构的研究中,既存在分歧同时也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关于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虽然有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差异背后遵循的是同一种分析方法——生命周期法,即网络舆情像一个生物体一样有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

(二)提出问题

由前文分析可知,在网络舆情演化研究中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研究框架,并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对网络舆情演化的认识和理解而言,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不应回避的是,在网络舆情演化的某些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说在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当前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是对演化过程不同阶段的划分,但舆情是如何从一个阶段演化到另一个阶段的?哪些因素促使舆情由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演化?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不得不说这是网络舆情演化研究方面的缺憾。因此,网络舆情演化研究要想有深入的发展,必须注意这些问题,从舆情演化的表面探讨其背后的逻辑。因此,本文以某一具体的网络舆情事件为例,对

舆情演化的全过程进行分析,以详实的数据为支撑,试图发现舆情演化过程中的一些突出特点。

二、案例的选取

本文选取的案例是B市因一次火灾事故引发的网络舆情。2017年11月18日18时,位于B市D区X镇一家公寓内发生了火灾,共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该公寓是典型的集储存、生产、居住功能为一体的“三合一”建筑。该建筑地下一层为冷库区,共6个冷库间,总面积5 000平方米,当时正处于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地上一层为餐饮、商店、洗浴、广告制作、生产加工储存服装等商户,总面积约6 600平方米;地上二层、局部三层均为出租房,总面积约8 300平方米,共305间房、租住400余人。据后续的调查显示,这次火灾起火部位为地下一层冷库,遇难者死因均系一氧化碳中毒,起火原因是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为预防类似事故,B市自11月20日起在全市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以“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工业大院、散乱污企业、违法建设为主要清理对象,进行安全隐患的排查、清理、整治行动。但这场以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目的的整治行动却被误读,网友及部分媒体称B市此次行动以消除安全隐患为名清理“低端人口”“外来人口”,以期高速完成先前制定的城市发展规划蓝图。这些言论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反响,并对舆情的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舆情的焦点发生了偏离,由对火灾本身的关注转向“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上。

之所以选择这次安全事故作为本文的案例,是因为它具备由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引发舆情的两个突出特征。一是舆情演化过程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到最后平息的过程。火灾发生后网络上开始出现火灾的图片和视频,只是数量有限而且发布主体是个人账号,所受到的关注和影响力也是有限的,直到权威媒体进行报道,此事件才成为网络的热点,至此网络舆情已经形成。二是在舆情演化过程中出现了次生舆情。

次生舆情是与原生舆情相对的概念,指的是“舆情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刺激性因素,引发针对当事主体或其他主体的新的舆情事件”^{[8][23]}。换言之,次生舆情指的是由原生舆情事件衍生出的其他议题引发的新舆情。原生舆情可以引发一个或多个次生舆情,次生舆情的议题可能跟原生事件有关,也可能旁及或引发其他事件。分析近几年网络舆情事件,几乎每个舆情事件都会引发次生舆情,次生舆情成为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突出特征。在这次安全事故中,同样产生了次生舆情,出现了一些不当言论。

三、舆情演化分析

就本质而言,网络舆情演化的过程就是信息传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传播量是有变化的,既有波峰又有波谷。通过信息传播量的变化说明舆情演化的特点是本文舆情演化分析的基本着眼点。

(一) 舆情传播过程分析

笔者通过与慧科讯业公司合作,利用 Wisesearch 软件平台,在设定的时间段内,以设置关键词的方式进行全网搜索,发现这次安全事故的相关报道 4 891 篇,其中传统媒体报导 3 314 篇,新媒体报导 1 577 篇,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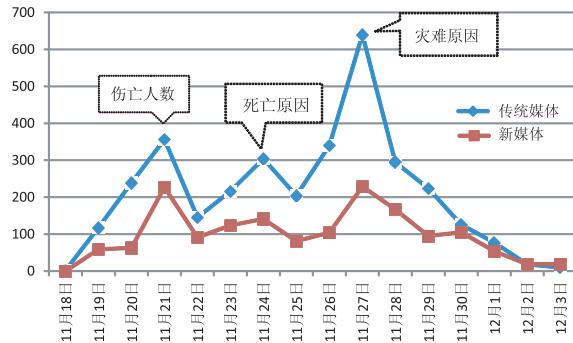


图 1 网络舆情传播过程

由图 1 可知,从传播过程趋势看,舆情传播经历了一个波谷、波峰不断起伏的过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传播是相似的;从传播信息量来看,

一共出现了三次峰值,第一次峰值出现在 21 日,是政府发布遇难情况的第二天,主要发布内容为伤亡人数,还有遇难者名单和警方采取的措施;第二次峰值出现在 24 日,是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公布遇难者死亡原因的第二天;第三次传播峰值出现在 27 日,是灾难原因公布的第二天。

纵观舆情传播的整个过程,共出现了三次传播波峰,而这三次波峰无一例外都是出现在政府相关部门公布火灾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之后,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舆情传播波峰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关键性信息在网上传播一定时间后才会达到峰值,可以预见,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种信息传播达到峰值的时间越来越短;第二,在信息传播内容方面,只有内容聚焦即关键性的信息才可能大量传播进而达到峰值,也就是说在峰值上传播的内容是相对单一的。此外,就这次舆情传播整体而言并没有脱离政府的控制,政府在这次舆情传播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三次波峰的形成是可以预期的,因此,对于政府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需要重视。

(二) 舆情传播媒介分析

1. 传统媒体

在这次舆情传播过程中,对此次事件报道的立体媒体(网站、APP)的报道量占据了绝对主导,为 3 199 篇,占比 97%;平面媒体(报刊、杂志、通讯社)报道 115 篇,占比 3%,详见图 2。对此次事件共有 433 家立体媒体进行了关注报道,主要是以综合新闻类媒体为主,其中天天快报 APP 报道量居首;共有 75 家平面媒体参与报道。从媒体级别^①而言,A 类媒体报道 1 684 篇,占比 51%;B 类媒体报道 688 篇,占比为 21%;C 类媒体报道 942 篇,占 28%,详见图 3,由此可见,重要媒体对火灾事件都进行了高度关注。

^① 媒体级别划分根据多种因素判定,平面新闻媒体参考发行量、发行范围、广告价值等因素,立体新闻媒体参考 Alexa 排名、IP 值、PV 值等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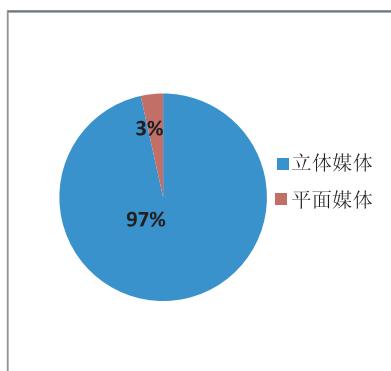


图2 媒体传播渠道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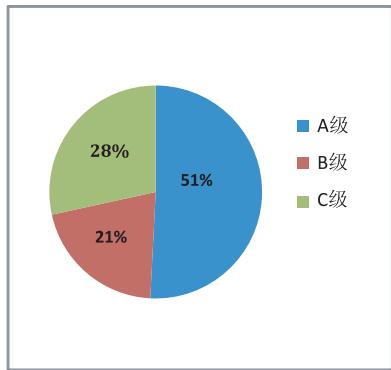


图3 传统媒体级别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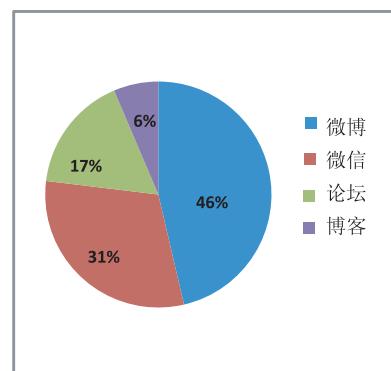


图4 媒体传播渠道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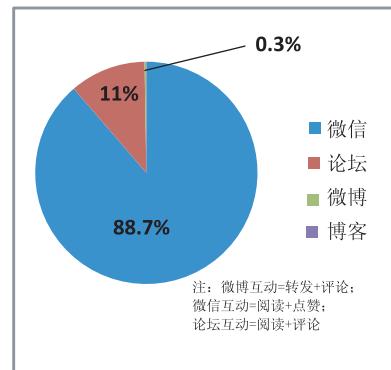


图5 网友互动分布

2. 新媒体

与传统媒体相比,虽然新媒体在传播量上存在差距,但由于其本身具有互动性强的特点,在舆情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从渠道分布来看,微博和微信是此次事件的主要传播平台,微博传播量达到731篇,占比46%;微信传播量482篇,占比31%;论坛传播量263篇,占比17%;博客传播101篇,占比6%,详见图4。网友互动总计达到5 305 631条,主要集中于微信和论坛平台,其中微信互动量4 704 681,占比88.7%,多篇报道互动达到10万以上;论坛互动量586 960,占比11%;微博互动量偏低,占比仅为0.3%;博客中没有网友互动,详见图5。

从媒体报道平台来源分布上看,此次新媒体传播,论坛发帖来源于39个论坛平台,其中天涯社区发帖最高,占据论坛总发帖量的26%;博客发帖来源于8个博客平台,其中传送门发帖最高,占据博客总发帖量的87%;微博

发帖全部来源于新浪微博。

在新媒体平台中,共有219个微信账号、39个论坛账号和507个微博账号发布了相关内容,其中微信报道TOP10账号全部为新闻媒体官方账号,澎湃新闻的发帖量和互动量均排名第一;论坛平台TOP10账号以个人账号为主,发帖量和论坛量均为第一的账号是“时光倾城”;微博平台TOP10账号以新闻媒体官方账号为主,其中@财经网发帖量和互动量均排名第一。

(三) 舆情焦点分析

在这次舆情传播过程中,舆情焦点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偏离,即由对火灾本身的关注转向了“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言论,包括“清理低端人口”“驱赶外地人”等,毫无疑问这种舆情焦点偏离增加了舆情的复杂性,给舆情的应对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具体来看,在11月20日B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公布展开为期40天的“安全隐

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开始,一些媒体在报道中除了对火灾本身的关注之外还加入了其他内容,如:“火灾加速了新建村的拆违行动,也助推了这里外来务工人口的迁徙。”^[11]“一场冬日里的大火,带走了 19 条性命,也加速了 B 市 D 区 X 村工业大院的腾退。”^[12]“突如其来的火灾,把悬在未知里的‘整改拆迁’推到了现实中。事发第三天,大部分商铺、作坊、公寓(违章建筑)都接到了三天内限期搬迁的通知,人们仓促寻找新的住所,搬家的卡车挤满了狭窄的土路。”^[13]与此同时,责令居住在存在安全隐患建筑的住户三天之内搬走的图文也在网上广泛传播,加上一些知名大 V 的发声,如某网络大 V 发微博声援 B 市需要搬迁的外地人,使此事件在网上迅速发酵。

为了更精确地描述在舆情传播过程中舆情焦点发生偏离的程度,本文通过比较政府通报中和其他相关报道中关键词的词频数量来说明。首先,建立关键词词库,通过统计发现,政府通报多次出现的关键词包括:遇难/名单/身份/隐患/清理/专项/违建/公寓/起火/死因/冷库/地点/公布/群租/消防/安全/租房/中毒/纪委/政府/限期/电气/故障/20 人/嫌疑/人为。在其他相关报道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包括:人口/之后/撤离/异乡/搬迁/外地/驱逐/清退/救助/暴力/低端/关停/低收入/折叠/疏解/怒/外来/政治/人文/关怀/逃离/驱赶/争议。其次,进行关键词词频数量的对比,结果详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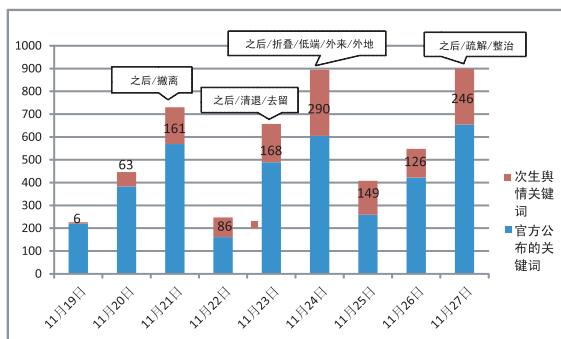


图 6 传播报道关键词变化趋势

在图 6 中,从时间趋势上看整个事件传播过程中重点词汇的词频变化可以发现,一方面同类报道的舆情关键词在不同阶段分布不同,次生舆情(“清理低端人口”等相关言论)24 号达到峰值;另一方面,同类报道的舆情关键词在不同阶段出现的高频词汇也不同,在 21 日和 23 日,次生舆情的高频词汇主要为“之后/撤离/清退/去留”,这时的舆情焦点已经渐渐发生了偏离;24 日次生舆情的高频词汇主要为“之后/折叠/低端/外来/外地”,舆情焦点的偏离程度在此时达到最大;27 日次生舆情的高频词汇主要为“之后/疏解/整治”,这与此阶段舆情修复——媒体就此次负面舆情延伸为讨论政府工作方式相印证。

四、研究发现

通过分析这次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发现这次舆情演化既有一般舆情演化的共性,同时也带有其自身的个性。从共性而言,这次舆情演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形成—爆发—平息”的过程,并没有突破常规的舆情演化路径。从个性来说,这次舆情演化表现出了以下四个突出特征。

(一) 传统媒体在舆情传播中占主导地位

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媒介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最初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兴起,再到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的崛起,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普及,可以说媒介形态的改变始终以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动力。因此,在人们的认知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社交媒体动摇了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互联网技术带动下社交媒体的发展,并没有看到传统媒体在互联网背景下自身的调整和适应。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打破了原有的自上而下的传播结构,开始从电视、广播的一对多为主体的等级体系向以互联网的多对多的网络体系转变。互联网已经成为开放的关系网络,传播变成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网状传播模

式,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传统媒体的传播结构等级体系被打破、被重构,一种新型的传播结构诞生。以报纸行业的转型为例,通过建立全媒体中心,实现了一个内容多个出口,从而使一个报社拥有多种媒介形态:报纸、电子报、新闻网络、手机报、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虽然新媒体对传统媒体主导地位形成了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大到足以动摇其主导地位的程度,传统媒体自身正在发生变化,在舆情传播中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一点在此次舆情传播中得到了证实。

进一步来说,可以理解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承担了不同的功能,传统媒体主要承担了信息采集和发布的功能,而新媒体侧重于与公众的互动,发挥了释放公众情绪、宣泄社会压力的作用。在二者的关系中,传统媒体对信息内容的编辑和发布,对于公众的反应是有直接影响力的。

(二)立体媒体的传播效果超过平面媒体

根据图2可以看出,从传播渠道而言,这次舆情传播以立体媒体为主,占比达97%,平面媒体占比仅为3%。这种数据对比印证了传播学界中的“信息过剩理论”(the concept of redundancy),即与单一符号相比,多种符号组合承载的信息更容易让受众记住。因为多种符号组合促使受众的不同感官在接受信息时进行协调、合作,从而提升了受众的感知能力,增强了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和记忆程度。

但需要注意的是,经过心理学家多次研究的结果显示,种类过于繁多的符号组合承载的信息会增加大脑处理信息的负担,对传播效果来说并不是最好的,最佳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两种符号的组合,因此出现了“双通道编码理论”(the dual-coding theory)。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存在两个认知记忆系统,这两个系统接受信息的侧重点不同,一个偏重于语言的接受,另一个偏重于非语言(图片、声音等)的记忆。基于此,为了使信息传播效果最佳,应当以两种符号组

合(图片+文字或声音+文字)的形式发布信息,这样产生的传播效果是最好的,美国心理学家罗德本特(Broadbent)就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他指出:“在使用双通道传递学习信息时会获得比使用单通道传递信息的记忆更强,效果更佳。”^[14]在此次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立体媒体的传播主要以图片+文字的方式,证实了“双通道编码理论”的传播效果。

(三)政府在信息传播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整体而言,“B市11·18火灾”的舆情并没有超出政府的控制和主导,虽然产生了次生舆情使舆情焦点发生了某种偏离,但并没有对舆情传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政府在舆情传播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来,舆情传播过程中共出现了三次峰值:21日、24日和27日,这三次峰值一个共同点是都是在政府发布权威信息之后才出现的。说明政府掌握信息的权威性,使得舆情的发展始终以政府公布信息的动态为基准,这种在政府信息影响下的峰值是可控的、可预测的。

此外在舆情修复阶段,官方媒体发声对舆情的扭转至关重要。11月24日,B市市委机关报《B日报》称,官方实施的整治行动目的在于消除安全隐患,与B市疏解非**功能工作不能混为一谈,外界认为当局在“排斥所谓‘低端人口’”,属于“错误认识”。

11月25日,据新华网消息,B市安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这是不负责任、毫无根据的,没有“低端人口”一说。这次专项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针对的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违法建设和违法经营,针对的是一些经营者只顾私利无视安全法规、无视员工和租户安全的违法行为。

11月28日,《B青年报》发文《D区X镇制定“拆除腾退临时救助政策”,困难群众可获过渡性食宿车票》:X镇制定了“拆除腾退临时救助政策”,为确有经济困难、有返乡意愿的群众

提供过渡性住宿和返乡车票,确保专项行动中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这些信息的及时发布对舆情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四) 次生舆情的产生源于政府行为和公众认知之间的不匹配

在此次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舆情焦点发生了偏离,受到了次生舆情的干扰,其中一些负面言论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公众的关注重点,干扰了政府正常救灾工作的开展。因此,对今后的舆情应对工作而言,一定要避免出现次生舆情,而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必须搞清楚次生舆情产生的内在机理。

具体这次舆情事件来说,次生舆情是从政府决定开展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始出现的,这说明次生舆情的出现与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有关。灾难发生后,为避免发生类似事故,政府决定开展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出发点是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动机,但却被公众误读,为何会产生这种误读?简而言之就是政府行为和公众感受之间的不匹配,对于政府的某项政策、措施,公众并不认可其背后的目的,而是从其他角度去解读。从宏观层面而言,这牵涉到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是政府在公众中公信力弱化的表现,任由这种情况恶化就会出现“塔西佗陷阱”,此点尤其值得警醒。

另外,具体到这次舆情,次生舆情的出现还与一些媒体刻意的引导有关。比如从议题设置伊始就蕴含了两个高烈度的命题——“排外”与“生存”。在此语境下,“驱赶”一词的感情对立无疑伤害了诸多作为城市外来建设者的情感。而专项整治活动覆盖区域则聚集了大量的底层民众,在被媒体镜头的聚焦放大下,群体的悲情色彩被释放,底层小人物的生存之困激发了舆论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于是舆论节奏被带偏。

五、结语

网络舆情演化是一个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试图发现一些特点、规

律无疑是困难的,但舆情事件的频发又迫切需要我们加深对网络舆情的认知和理解,以便在面对此类事件时有科学、有效的应对思路和措施,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就本文而言,并没有构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舆情演化模型,只是以具体的舆情事件为例,通过量化的数据,加深了对某些观点、看法的理解,以有助于整体上对网络舆情演化的把握,为相关部门的舆情应对提供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 [1] 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9-08-30). http://www.cnnic.net/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8/t20190830_70800.htm.
- [2] 刘毅. 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75.
- [3] 张玉亮.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生产原因与导控策略——基于网络舆情主体心理的分析视阈[J]. 情报杂志,2012(4):54–57.
- [4] 徐敬宏,李欲晓,方滨兴,等. 非常规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生成与管理[J]. 当代传播,2010(4):42–43.
- [5] 兰月新,曾润喜.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规律与预警阶段研究[J]. 情报杂志,2013(5):16–19.
- [6] 曹劲松. 网络舆情的发展规律[J]. 新闻与写作,2010(5):45–47.
- [7] 方付建.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 [8]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网络舆情分析教程(初级)[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 [9] 彭铁元. 网络舆情管理学[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5:71.
- [10] 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局. 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理论与实务[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20.
- [11] 大兴火灾中的生者与死者[EB/OL]. (2017-11-21). <https://www.douban.com/note/646005209/>. (下转第 74 页)

- [2] 周传铭. 济南市图书馆整理 · 济南快览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 [3] 罗腾霄. 济南市图书馆整理 · 济南大观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 [4] 山东日本博览会之豫备[N]. 大公报(天津版), 1908-06-26(5).
- [5]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山东省志 · 城乡建设志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6] 刘连仲. 建国前济南市的公共交通 [M]//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济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 济南: 山东省出版总社济南分社, 1984.
- [7] 马德坤. 民国时期济南公会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2.
- [8] 本市各种车辆统计[N]. 济南日报, 1936-07-19(4).
- [9] 里田条次. 济南华人商工名录[M]. 济南: 日本商工会议所出版社, 1940: 244 - 245.
- [10] 刘道元. 抗战期间山东省会区(上)[J]. 山东文献, 1985(2): 27.
- [11] 各机关公务员编制脚踏车队[N]. 济南日报, 1936-04-25(4).
- [12] 整理公园不准骑脚踏车[N]. 山东民国日报, 1936-05-24(4).
- [13] 修筑龙洞路[N]. 山东民国日报, 1929-09-22(6).
- [14] 建设厅修筑济南龙洞间汽车路[N]. 山东民国日报, 1929-10-17(6).
- [15] 济东濮段加开龙洞汽车[N]. 济南日报, 1936-04-10(4).
- [16] 龙洞佛峪昨一度变为热闹市场[N]. 济南日报, 1936-11-02(4).
- [17] 春光明媚正宜游览[N]. 济南日报, 1937-03-31(4).
- [18] 灵岩马路修竣后, 禁止大车通行[N]. 济南日报, 1937-06-02(4).
- [19] 城头马路警局派干警梭巡[N]. 济南日报, 1937-06-27(4).
- [20] 修装城头马路电灯[N]. 济南市政周刊, 1933-08-26.
- [21] 胶济铁路规定上下车办法[N]. 济南日报, 1936-05-27(5).
- [22] 闻市长实行临时纠察, 数月后济市焕然一新[N]. 山东民国日报, 1934-11-20(9).
- [23] 胶路各次客车改订时间[N]. 济南日报, 1936-05-24(4).

(责任编辑:李秀荣)

(上接第 66 页)

- [12] 北京西红门镇大火后, 村镇工业大院在加速腾退 [EB/OL]. (2017-11-2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30844>.
- [13] 大兴火灾后的异乡人: “这个地方也待不住了” [EB/OL]. (2017-11-21). http://news.ifeng.com/a/20171121/53455729_0.shtml.

- [14] BROADBENT D E. Successive response to Simultaneous Stimuli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003, 40(1): 103 - 114.

(责任编辑:李秀荣)